

中国式社会主义 3.0：重庆的探索

王绍光*

【摘要】作为一种人类理想，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在不同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方式不可能一模一样。在“匮乏阶段”，中国发展出社会主义 1.0；在“温饱阶段”，中国发展出社会主义 2.0。进入了“小康阶段”以后，中国正在探索社会主义 3.0。重庆是诸多探索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案例。试图从理论上解读重庆的经验。

【关键词】社会主义 中国模式 重庆

【中图分类号】D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2011）06-0048-31

作为一种人类理想，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在不同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方式不可能一模一样。在坚守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历史任务。

一、经济发展阶段与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各级政府与中国人民一直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与所处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道路。回首过去六十年，中国已经跨越了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并在各个阶段探索出相对而言比较成功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

*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

本文是笔者在王绍光（2011）一文的基础上修改、拓展而成的。

举世瞩目的成就（王绍光，2009a）。已迈入第三个历史阶段的中国正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匮乏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一直持续到1978年。按1990年国际不变价格计算，在这个阶段，中国的人均GDP从500美元左右持续攀升，但一直低于1000美元（图1）。把这个阶段称为“匮乏阶段”，是因为它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其产出仅够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为了在剩余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发展经济，中国在这个阶段采取了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为的是把不多的剩余集中起来，优先发展重点产业与关键社会事业。与此同时，在匮乏阶段，当人均收入十分低下、人们普遍贫穷时，尽量保证所有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是在那种条件下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唯一途径。由于人均收入只够维持基本生存，如果分配不均，势必有人连基本生存也得不到保障。因此，在分配政策上，中国那时十分注重公平，往往采取票证的方式定量供应生活必需品。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式社会主义1.0版本固然有缺陷（如物质生活水平改善缓慢），但其成就不容抹杀。且不说解放后仅三年，经济就迅速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其间还与世界头号强国在朝鲜打了个平手），从1953年到1978年，GDP年均增长率也高达6.5%，虽然比不上同期东亚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但放在世界范围内也相当亮丽。更重要的是，1.0版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为其后续的发展奠定了硬、软两方面的基础。有人经常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话批评大跃进，但他们却有意或无意忽略阿玛蒂亚·森对毛泽东时代的总体评价：“1949年政治变革时中国的生活条件与当时印度的情况大致相差无几。两个国家都属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列，死亡率、营养不良和文盲程度都很高。”但到中国改革前，“印度和中国所处的相对地位就决定性地确立了”；“改革前中国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和社会变化方面的成就，对改革后的成绩做出了巨大的积极贡献，使中国不仅保持了高预期寿命和其他相关成就，还为基于市场改革的经济扩展提供了坚定支持”（森、德雷兹，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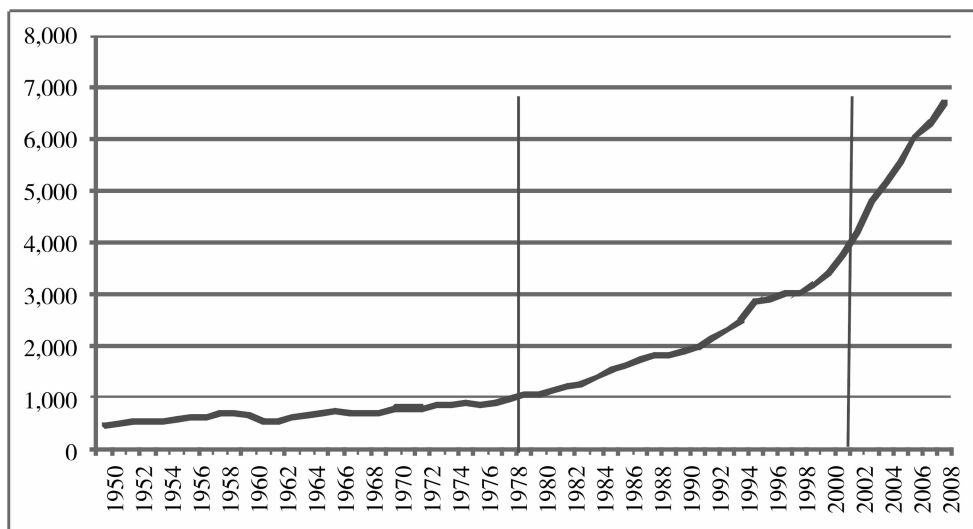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人均GDP (1990年国际美元)

资料来源：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网站，http://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vertical-file_02-2010.xls。

197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进入“温饱阶段”（图1）。与此同时，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公有制的一统天下逐步被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所替代，计划经济逐步演变为市场经济（不过，规划依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分配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打破了“铁饭碗”，端走了“大锅饭”，希望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式，激励所有人、所有地区千方百计摆脱贫困、创造财富。

在温饱阶段，既然人均收入水平已足以维持生存，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途径是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大多数人的收入与消费水平，一方面扶贫减贫。这正是中国式社会主义2.0版本的精髓。

在经济发展方面，从1978年到2001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6%，大大快于前30年的6.5%。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超复杂经济体，中国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这在人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奇迹”。如果说在匮乏阶段，人们还吃得不太饱、穿得不太好的话；在温饱阶段，随着人均收入从1000美元逐步增加至4000美元，绝大多数中国人已有条件吃得越来越有营养、穿得越来越体面。

中国在扶贫减贫方面的成就也许更值得称道。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计算，从1981年到2004年，中国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6.52亿降至1.35亿，5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而在同一时期，全球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只减少了4亿。换言之，如果排除中国，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难怪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赞叹道：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扶贫与经济管理局，2009:3）。

当然，2.0版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也有缺陷。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一阶段，中国在相当大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公平、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让人们普遍感到不安全、不平等、不舒适。

2002年，中国人均GDP跨越了4000美元大关，进入“小康阶段”。新阶段一定会催生新版社会主义。那么3.0版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与2.0版本会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说在温饱阶段私人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社会福利改善的话，那么，进入小康阶段后，私人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已不再是社会福利改善的主要动力，它与社会福利改善的正相关关系开始递减，甚至走向反面（黄有光，2003）。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1958年，加尔布雷思发表了《丰裕社会》一书。他敏锐地观察到，当时美国的丰裕只是私人产品与服务的丰裕，而公共产品与服务实际上相当贫乏。虽然不少美国家庭拥有私人住宅、汽车、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但即使在美国引以为傲的纽约市，加尔布雷思看到的也是，“学校都已古老且过分拥挤。警察力量太小而且饷给过低。公园和游玩场地不够。街道和空地是污浊的，卫生部门设备不足而且缺乏人手。在城市工作的人们要进城去的交通工具不能确保且很辛苦，而且愈来愈差。市内交通也是拥挤不堪，很不卫生而且龌龊。空气也很污浊。在马路上停车是禁止的，但别处又没有空地”（加尔布雷思，1965:213）。在加尔布雷思看来，在私人产品和服务与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之间必须寻求某种平衡。否则，增加私人产品和服务毫无意义。例如，“汽车消费的增加需要便利这种消费的街道、公路、交通管制和停车场所的供应。警察和公路巡逻队的保护劳务以及医院设备也是必需的”（加尔布雷思，1965:215）。为了取得这种平衡、为了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加尔布雷思强调，进入丰裕阶段后，社

会必须大幅度增加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投入。不过，加尔布雷思的忠告并没有在美国产生多大效果。1998 年，在为《丰裕社会》出版四十周年纪念版写序时，他不胜唏嘘地感慨道：“我的批评仍然有效。不错，政府确有公共开支，但往往用于购买杀人武器，或用于给大公司种种好处。除此之外，限制公共支出的压力像以前一样十分强大。结果，虽然我们的私人消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丰裕，但我们的学校、图书馆、公共娱乐场所、医疗保险、甚至执法力量都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与过去相比，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差距可以说是越拉越大”（Galbraith，1998：5-6）。

社会主义的中国理应能够做得更好。在基本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温饱问题之后，3.0 版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应探索如何加大对那些能切实改善大多数人福利领域（如公共住房、公共安全、公共交通、生态保护、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基础设施、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的公共投入。具体而言，“衣”“食”问题基本解决后，还需改善“住”（宜居）“行”（畅通）问题；私人的衣食住行问题解决后，还需解决公共消费问题（平安、生态、健康）、人类安全问题与社会平等问题。

在这些方面，重庆近年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作为一个内陆省级单位，重庆比沿海发达省份更像中国的一个缩影（表 1）。因此，它的探索也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重庆可以做到的事，其他绝大多数省份也一定能做到。重庆的经验可以概括为几个关键词：“五个重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国民共进”“群众路线”。体现在这些关键词中的重庆经验不仅创造出中国式社会主义 3.0 的新要素，也包含着中国式社会主义 2.0 和 1.0 的宝贵遗产。

表 1 重庆与全国（2008 年）

	人均 GDP	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 入（元）	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 入（元）	城市居民 家庭恩格 尔系数	农村居民 家庭恩格 尔系数	城市 化水平	人民发 展指数
重庆	18 025.0	14 367.6	4 126.2	39.1	53.3	50.0	0.783
全国	22 698.0	15 780.8	4 760.6	37.9	43.7	45.7	0.79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重庆统计年鉴，2009。

二、“五个重庆”

2008年7月，重庆将自己正在实施和计划实施的政策重点概括为“五个重庆”，即宜居重庆、畅通重庆、平安重庆、森林重庆、健康重庆^①。一个月后，“五个重庆”的规划相继出炉；几个月后，跨系统的“五个重庆”建设领导小组分头成立。

（一）宜居重庆^②

“衣”“食”无忧后，“住”对普通民众福祉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因此，“五个重庆”中排在首位的是“宜居重庆”，其领导小组由市长牵头^③。

“宜居重庆”包含“居住条件、公共空间、服务设施”三方面内容，其目的是改善居住条件（包括保障住房、商品住房、住宅品质、社区服务四部分）、优化公共空间（包括城市广场、市容环境、特色风貌三部分）、完善服务设施（包括商业、文化、市政三部分）。

改善居住条件是“宜居重庆”的重点；其目标是到2012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2008年的27.34平方米提高到30平方米；同时，逐渐淘汰农村不安全的土坯房、石头房，让砖混结构以上住房比例达到95%，有卫生间的农房比例达70%；农村新建房屋中“巴渝新居”推广率达到40%。到2017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要进一步达到35平方米；农村新建房屋中“巴渝新居”推广率达到60%^④。

① 2005年，青岛曾提出“三个青岛”（帆船之都、影视之城、音乐之岛），但这个提法不能概括青岛的总体发展方向。

② 参见宜居重庆官方网站 <http://www.yjqc.gov.cn/>。

③ “宜居重庆”的官方网站是 <http://www.yjqc.gov.cn/Index.aspx>，可以在此找到大量关于“宜居重庆”的信息，包括市宜居办的工作简报。

④ “巴渝新居”工程要求农房集中修建，功能完善，环保节能，风貌突出，村容整洁。“巴渝新居”的修建，按市建委编制的《巴渝新农村民居通用图集》施工，主要设计为川东民居的风格，更有“重庆味”。“巴渝新居”共设计了26种造型，分为经济型、适用型、小康型3类，造价由低到高，最低的造价300元/平方米，最高的造价700元/平方米。

人均住房面积扩大并不能保证人人都有房住。为了实现“居者有其屋”（而不是“居者有其产”）的理想，重庆改变了住房由市场单一提供的体系。重庆市政府把住房建设分三类，并采取了“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限制”的策略。

第一，10%的高收入人群购买高档商品住房；这些人不仅要支付高房价，今后还可能要支付“特别房产消费税”^①。

第二，60%左右的中等收入家庭住在普通商品住房。近年来，重庆经济高速增长，但在管理商品房市场方面，重庆不是盲目放手让“市场”肆虐，而是打了一套“组合拳”，使得房价保持平稳态势，与全国其它大城市形成鲜明对比，在西部地区，重庆的平均房价目前仍低于成都、贵阳、西安等城市。重庆计划在未来保持这种鸟笼市场的局面，让城市双职工能用6年半的收入购买得起中小套型、中低价位的商品住房。

第三，30%的中低收入群体由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宜居重庆”的关键是“穷人”也可享受宜居。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反复强调，帮“穷人”造房是政府的责任。基于这个理念，该市保障性住房实施“5+1”模式，即过去采用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农民工公寓五种保障方式，与公共租赁房这种新的保障方式并举，充分满足群众基本住房需求（重庆市政府网，2010a）。前五种保障方式的着眼点是困难人群与农民工，公共租赁房的居住者则着眼于未列入廉租住房保障行列、又暂时买不起商品房的中低收入人群和新就业人员等“夹心人群”。根据重庆的规划，2010年全市计划开工建设50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房，年底向社会投放20万平方米。3年时间内完成2000万平方米的建设任务^②；未来10年，将建设4000万平方米的公共租赁房。同样在2010年，全年计划新开工廉租住房170万平方米，建成220万平方米，是重庆市廉租住房建成量最多的一年。除此之外，重庆还计划在这一年新开工建设经济适用住房180万平方米、农民工公寓25万平方米，改造危旧房156万平方米，并启动53个城

① 为了遏制房价不正常波动，重庆市计划对高价商品房征收特别房产消费税，并将方案上报国务院。

② 2010年6月24日至25日，中共重庆市委召开三届七次全委会，专题研究民生工作，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计划把3年的目标从2000万平方米提高到3000万平方米，60万套公租房。参见《重庆力争两年半内在十大民生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http://202.123.110.3gzdt2010-06/26/content_1638092.htm。

中村征地拆迁（重庆市政府网，2010a）。

（二）畅通重庆^①

如果说“宜居重庆”着眼于解决“住”的问题，“畅通重庆”则着眼于解决“行”的问题。“畅通重庆”在“五个重庆”中重要性仅次于“宜居重庆”，其领导小组由常务副市长挂帅。

众所周知，重庆主城区是著名的山城，主城区以外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独特的地理状况使得重庆“行”的问题一直是妨碍人民福祉提高的绊脚石。

“畅通重庆”旨在一举改变这种状况，其总体目标是通过跨越式发展，把重庆建设成为全国最畅通的城市之一。这里“畅通”是指主城区畅通，整个重庆城乡畅通，与整个大西南畅通，与周边省份畅通，与长三角、珠三角、东南亚畅通，与全国、全世界畅通。

与其他大中城市一样，实现主城区畅通的关键是“排堵”。重庆的做法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实行“公交优先”，在原有的公共汽车之外，大力发展索道、轻轨、地铁，计划到2012年，全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到140公里。另一方面，提高城市交通管理水平，使主城干道的平均车速保持在30公里/小时以上。到2012年，重庆将实现“半小时主城”：主城核心区任意两点间的平均通行时间控制在半小时以内，主城拓展区任意一点到核心区的平均通行时间控制在半小时以内。

为了让全市城乡之间畅通，重庆正在推进农村公路“乡通畅”“村通达”“村通畅”工程建设，目的是构筑一个覆盖城乡的公路网络^②。2009年重庆市全年新建、改建农村公路1万多公里，超过年初计划25%，实现了112个乡镇通畅、834个行政村通达、770个行政村通畅的目标。重庆市乡镇通畅率、行政村通达率和通畅率分别由2008年底的83.5%、85.7%和38.9%快速提高到97.8%、96.2%和

① 参见畅通重庆官方网站 <http://www.ctcq.gov.cn/>。

② “乡通畅”意味着乡镇政府所在地与区县政府所在地的连接公路有一条以上（含一条）实现了油化或硬化水泥路；“村通达”指行政村村民委员会驻地或村中心校所在地与乡镇政府所在地有一条以上（含一条）联结道路实现了油化或硬化；“村通畅”意味着行政村有一条以上的道路实现油化或硬化。

51.7%，满足了数以百万计农村居民的出行便利。2010年，重庆又计划投入75亿元新建、改建8000公里农村公路，重点向相对落后的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倾斜，以期实现全市剩余19个乡镇通畅、330个行政村通达和400个行政村通畅，建成后全市的乡镇通畅率、行政村通达率将双双达到100%（重庆市政府网，2010b）。重庆还加快构建农村客运网络，2009年，全市乡镇和行政村客车通达率分别达到98.1%和64.6%，使广大农村地区出行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2010年，预计全市乡镇和行政村客车通达率将分别达到99.4%和72.6%（重庆市政府网，2010c）。几年后，重庆任何一个行政村都会有客车服务，通过农村公路与高速公路网，把它们与整个重庆连接起来。到2012年，重庆将实现高速公路市内4小时通达。

除了让内部畅通起来外，重庆还在加快高速公路、铁路、水运、空运建设。到2012年，重庆将变成大西南综合交通枢纽，周边省会城市8小时通达；到2015年，实现铁路周边省会城市4小时通达，长三角、珠三角、东南亚8小时通达；长江黄金水道成为西部内陆出海主通道；江北机场成为国际性空港。

（三）森林重庆^①

自古以来，人们就很清楚衣食住行的重要性，但直到经济增长挂帅导致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以后，人们才意识到山川秀美、空气清新也同样重要。为了改善重庆的生态环境，“五个重庆”把“森林重庆”排在第三，其领导小组由市长牵头^②。

“森林重庆”的意义绝不仅仅是种一些树。在人称“大火炉”的重庆多种一些树，当然有助于美化城市景观、调节小气候和增加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使他们的生活更舒适、更健康，使他们眼光所及，满目青山、赏心悦目。但更重要的是，在75%以上面积是山地和丘陵的重庆，提高森林覆盖率可以减少土壤侵蚀，减少水土流失（尤其是流入三峡库区的泥沙）；增加森林资源还有利于涵养水源、净化水质（尤其是确保三峡水库的水量 and 水质）。

除了环保意义以外，大规模植树造林还可以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碳汇

^① 参看森林重庆官方网站 <http://senlin.cq.gov.cn/>。

^② 继重庆率先提出“森林重庆”后，浙江、云南等提出建设“森林浙江”“森林云南”。

经济，把重庆那些大片的荒山、穷山变为秀山、宝山，变为生态旅游的福地，为农民提供增收致富的机会，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飞跃。

2008 年 8 月启动的“森林重庆”包含城市、农村、通道、水系、苗圃基地以及长江两岸等六大森林工程，其总体目标是，到 2012 年，森林覆盖率达到 38%，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37%，都市区建成国家森林城市，林业总产值达到 250 亿元，农民人均林业年收入达到 500 元；到 2017 年，森林覆盖率达到 45%，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39%，林业总产值达到 500 亿元，农民在林业上的人均收入达到 1000 元以上（表 2）。

表 2 森林重庆发展目标（1996 年 - 2017 年）

	1997	2008	2012	2017
森林覆盖率（%）	20	34	38	45
建成区绿地率（%）	18	34.5	37	39
林业总产值（亿元）	13	174	250	500
农民人均林业收入（元）	20	336	500	1 000
活立木蓄积量（亿立方米）	0.78	1.3	1.46	1.72
固碳（万吨碳当量）	1 419	2 298	2 568	3 041
释放氧气（万吨）	1 030	1 668	1 863	2 206

资料来源：重庆市林业局，“森林工程”网页，<http://senlin.cq.gov.cn/>。

从 2008 年 8 月到 2009 年底，重庆在植树造林方面投入 178 亿元^①，是前十年投入总和的 2.7 倍，种树 798 万亩，植树 9.1 亿多株，比前十年总和还多出 129 万亩，实现林业产值 200 亿元，农民人均林业收入超过 400 元，比 2008 年增加 120 元，森林覆盖率已达 35%，由过去全国的第 17 位提升到第 13 位，森林旅游人数超过 1 300 万人次（新华网，2010）。2010 年春季，贵州、云南、四川等周边省市的旱情十分严重，但同处西南地区的重庆旱情却相对较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① 在 178 亿元中，国家和市级财政投入 72 亿元，主要用于社会效益强的防护林和生态林项目；其他新增资金 90% 依靠社会资本，而在社会资本中，非公有制经济又占到 70% 左右。

森林工程留住了水源，缓解了旱情。

2010年初，重庆已经被住建部命名为“国家园林城市”，在44个申报城市中名列第一。但重庆并未满足，而是把“森林重庆”提速，“还要用一年时间种十年的树！”到2012年，让全市森林覆盖率从原计划的38%提高到40%（重庆晨报，2010）。

（四）平安重庆

在“五个重庆”中，最引人瞩目的恐怕是“平安重庆”。如果用互联网搜索“重庆”和“薄熙来”，跳出来的网页绝大多数与“打黑除恶”有关。不错，重庆的“打黑除恶”“灭枪治暴”“跨区域破案追逃”等社会治安综合整治专项战役深得人心，共破获刑事案件15.2万起，打击处理罪犯6.7万人，查处治安案件60万起、违法人员50万人。这些专项行动让重庆市民的安全感明显增强，国家统计局第九次全国群众安全感入户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重庆群众安全感指数达96.62%，名列全国第九，居4个直辖市之首。无怪乎，公安部对重庆市公安局予以全国通令嘉奖（重庆商报，2010）。

不过，前面的讨论清楚地表明，“平安重庆”在“五个重庆”中其实排列第四，它本身虽然很重要，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比它更重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在“平安重庆”中，“打黑除恶”也只是其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实际上，“平安重庆”不只是个社会治安问题，它被界定为社会安全、生产安全、食品药品安全、交通安全、居住安全“五大安全”和法制环境、执法队伍“两大建设”。换句话说，与“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一样，“平安重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改善和保障民生，它关注的是人民群众的食、住、行与工作安全问题。

“平安重庆”有一整套指标体系，包括群众安全感指数、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工矿商贸就业人员10万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万车死亡率、火灾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食品中毒死亡事故、民间纠纷调解成功率、符合条件又有援助需求的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面、群众对执法队伍满意度等，并且规定了到2012年各个指标应该达到什么水平，如到2012年，各类事故总死亡人数比2007年下降36%。

为了实现“平安重庆”的目标，重庆市区两级财政、市级有关部门、各级企业纷纷加大安全投入，2009 年全市安全投入总量达到 90 亿元。以生产安全为例，在这一年中，重庆在所有区县、35% 的乡镇成立了专门的安全生产监督执法队伍，配备了 588 辆执法车和各种执法装备，把安监的触角延伸到了乡镇、街道乃至社区、村社。

在全市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连续 5 年下降的基础上，2009 年，重庆生产安全事故死亡 1 928 人，比上年下降 2.7%。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 0.30 人，下降 23.1%；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死亡 139 人，下降 38.8%；煤矿百万吨死亡 5.44 人，下降 20.2%。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1 209 人死亡，下降 0.8%；道路交通万车死亡 6 人，下降 21.1%（重庆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2010）。为此，重庆获得全国 2009 年“安全保障型城市示范区”的荣誉。

2010 年前四个月，重庆安全生产形势进一步改善。全市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455 起，死亡 537 人，同比减少 179 起，减少死亡 182 人，分别下降 28.2% 和 25.3%。道路交通事故 322 起，死亡 375 人，同比分别下降 29.1% 和 25%。道路交通已连续 37 个月、水上交通已连续 83 个月杜绝了重特大安全事故（重庆市政府网，2010d）。

为了治理高危行业这个安全生产事故的“重灾区”，重庆加快了淘汰高危行业产业的步伐，计划于 2010 年 9 月底前关闭 1 000 家“四小”生产企业，包括 300 个小煤矿、638 个小非煤矿山、50 家小危化生产企业和 12 家小烟花爆竹厂，从源头减少重大危险源（华龙网，2010）。随着这批危险企业的关闭，重庆的安全生产水平必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五）健康重庆^①

重庆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非常典型的城市，贫困人口多、低保人口多，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居民的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②。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把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作为社会主义 3.0 的重要内容。

① 参看健康重庆官方网站 <http://www.cq.gov.cn/5cq/jiankang/>。

② 2005 年，重庆国民体质抽样合格率仅为 86.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0.5%，比西部平均水平低 0.2%。

“健康重庆”的“健康”是广义的健康，包括体质、饮食、生育、行为、精神五方面的健康。为了促进五方面的健康，重庆确立了“发展体育运动、增进体质健康”，“严格食品安全监管、加强饮食健康”，“加强妇幼保健、保障生育健康”，“培养健康生活方式、倡导行为健康”，“加强心理卫生服务、重视精神健康”，“建立健全健康服务体系、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健康服务”六大重点任务，并为每个重点任务设定了具体的指标（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2008）。

“健康重庆”的总体目标是：①市民健康素质超过全国平均水平；②市民健康保障水平处于西部前列；③市民健康行为基本养成。为了实现这些总体目标，充分发挥政府各部门的主导作用，广泛动员全社会的积极参与，重庆专门制订了“健康重庆”的卫生行动计划和体育行动计划。

卫生行动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到2012年，全市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7岁，到2020年，基本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人人享有安全食品、人人享有清洁饮水、人人享有健康身心”的目标，建成城乡统筹的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基本药物制度，主要卫生指标和健康指标达到全国先进水平（重庆市人民政府，2008a）。

体育行动计划总体目标是，到2012年逐步形成亲民、便民、利民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公共体育服务综合水平显著提升；建成一支规模合理、结构科学、素质优良的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队伍；体育产业规模逐步扩大，体育服务业品种门类较为齐全；加快建设完善群众身边的健身的场地和设施，建成一批功能完善、能承接高水平竞赛和大型群众体育活动的公共体育场馆和设施（重庆市人民政府，2008a）。

这两个行动计划共设有几十项具体目标或行动内容，并明确了相应的牵头部门、协作单位、资金保障。重庆在两个行动计划起步之时便表示，到2012年，“健康重庆”卫生行动计划将投入资金280亿元，“健康重庆”体育行动计划也将投入资金73亿元（华龙网，2008）。而仅2009年一年，卫生方面就投入了85.4亿元，体育方面投入21.4亿元。显然，如果趋势不变，到2012年，两个行动方面的总投入一定会超过原计划。事实上，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已在2009年提前两年实现了国家规划目标（瞭望，2010）。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重庆不仅强调“野蛮其体魄”，同时也强调“文明其精神”，强调激发全市人民的精气神，保持精神健康^①。过去，重庆不少人闲来无事便无休无止地打麻将、“斗地主”。更有甚者，一些人（包括一些党政干部）理想信念淡漠、价值观扭曲、精神萎靡、腐败堕落^②。为了扶正驱邪，重庆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把它与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结合起来，相继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并千方百计让“唱读讲传”进农村、进社区、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进军营。这些活动被一些媒体简化为“唱红”。

到2010年4月底，在红歌方面，重庆已编辑出版两辑《经典歌曲》图书和光盘，向全市推荐红色歌曲125首，开展红歌传唱活动10.98万场，开展全市性“唱读讲传”综合文艺晚会64场，参与市民超过6914万人次；在经典方面，已经出版了18辑《读点经典》口袋书^③，发行量达到855多万册；在故事方面，编辑出版了15期《讲故事》专刊，推荐和编写了4000余个故事，举行一定规模故事会5.6万多场，讲述故事15.03万个（场次）；在箴言方面，参与手机箴言转发的用户达到了1.44亿人次，全市手机用户转发箴言1.23亿条（李伟，2010）。同时，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上开辟了专栏专题，刊播红色歌曲、赏析经典作品、刊载优秀故事、播发精彩箴言（钟谟智，2010）。据一份重庆市向中央领导汇报的材料称，截至目前，重庆的此项活动已经具备了“内容具体化、形式生动化、主体群众化、机制常态化”的特点（宋超，2010）。“唱读讲传”活动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可和热情参与，据不完全统计，90%以上的重庆干部群众参与了不同形

① 薄熙来在“健康重庆”动员大会上说，“毛主席二十多岁就写了《体育之研究》，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而且深刻指出，‘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情感，因而强意志’‘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参见：http://cq.cqnews.net/szzwyw200812/t20081219_2794269.htm。

② 2008年底，重庆市委宣传部曾向全市干部群众发放11万份调查问卷。结果显示，部分人理想信念缺失，价值观错位，有31.92%的人出现非马克思主义倾向，13.67%的人对共产党长期执政持不拥护和无所谓态度，有14.48%的人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持不拥护和无所谓态度，有20.13%的人推崇享乐主义，有14.13%的人推崇拜金主义。

③ 重庆编辑出版的《读点经典》汇集了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言，唐诗宋词、孔孟之道，还有马恩列、毛泽东等革命者的精选语录等等。薄熙来说，“我们总结中国的价值观后，发现一不能照搬西方的价值观，二不能完全照搬孔孟之道，三不能搞极左的一套。‘唱红’的红就是指为老百姓服务。这是共产党红的根本。我们搞‘唱读讲传’，目的就是要在传承中国古典文化的经典和共产党红色传统的基础上，树立起我们自己的现代价值观。”

式的“唱读讲传”活动（新浪网，2010）。

重庆的“唱红”在全国产生巨大的反响，也引来少数人的质疑。对此，薄熙来的一段回应十分到位：“有些人说重庆的‘唱红’是搞左的一套，不能这么认为。实际上，‘红’讲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为老百姓服务，这是共产党当时建党的本意。共产党成立就是要为老百姓服务。所以，‘唱红’这个概念说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瞭望周刊，2010a）。

三、“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

重庆市共有40个区县，呈现“一圈两翼”的格局。“一圈”是指以重庆主城区为中心、以1小时车程为半径的“一小时经济圈”，涵盖23个区县。“一圈”集中了全市近六成的人口，资本、产业密集，基础设施完善，科研力量雄厚，GDP占全市总量的80%左右。“两翼”则是指以三峡库区为主的渝东北（含11个区县）和少数民族聚居的渝东南（含6个区县）。“两翼”人口近1000万人，面积占全市的三分之二，境内80%为山地丘陵，人均耕地仅为全国的三分之二，中低产田比重高达80%。不过，“两翼”林地资源优势突出，共有林地4700万亩，占全市的77%，具有较高的开发利用潜力。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约和历史条件的影响，“两翼”的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薄弱、人均收入低下、贫困人口集中。2009年，“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低1250元，比“一圈”低1877元。“两翼”也是我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17个区县中有15个贫困区县，14个国家重点贫困区县，贫困人口达113万人，占全市贫困人口的80%。

很明显，重庆发展的“短板”在“两翼”。“两翼”落后的问题不解决，实现“五个重庆”的总体目标就要大打折扣。建设社会主义新重庆必须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帮助“两翼”尽快脱贫致富，缩小与“一圈”的差距，这是中国式社会主义2.0的宝贵遗产。

早在2007年，重庆就分别编制了“一圈”与“两翼”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关于建立健全一圈两翼对口帮扶机制的意见》，明确了“一圈两翼”总体发展战略（华龙网，2007）。“一圈”在产业、人才、技术、资本、管理等方面具有

优势，而“两翼”在自然资源、劳动力等方面具有优势。独具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对口帮扶机制力图把这些优势结合起来，一方面促进“一圈”产业升级，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加快“两翼”人口转移，疏解环境压力，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张桂林、杨柳，2008）。具体而言，除了运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让“一圈”带动“两翼”齐飞^①，重庆还在“一圈”与“两翼”之间构建了产业、投融资、基础设施、人口转移四个对接联动机制。产业对接联动是指共建优势互补型产业链，为“一圈”企业在“两翼”建立半成品加工基地，发展上下游关联产业链条^②；投融资对接联动是指“一圈”区县利用自己的信用进行融资，投入到对口帮扶区县搞项目开发，以后帮扶的园区项目产生税收再予返还^③；基础设施对接联动是指通过交通、水利、电力三方面的统一规划建设，打破帮扶联动中的“瓶颈”^④；人口转移对接联动是指“一圈”区县通过社会保障补贴、贷款贴息等优惠政策，鼓励属地企业积极吸纳“两翼”劳动力，尽可能多地承接“两翼”地区人口，并完善转移人口在就业、就医、定居、子女入学等方面的政策^⑤。

这些措施已经开始产生效应，“一圈”与“两翼”之间的收入增速差距开始缩小，协调发展态势开始显现。例如，从2008年10月开始，“两翼”地区一般预算收入增速开始接近“一圈”，两个月后实现超越。到2010年4月，“两翼”地区

① 在“十一五”期间，重庆财政计划用于“两翼”建设的扶持资金超过300亿元。

② 重庆的“一圈”把重点放在构筑清洁环保、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支撑体系和都市经济群上，而“两翼”则致力于在能源、矿产、特色农业、旅游、劳务经济等方面形成较完善的产业链。

③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重庆十分注重国有资产在投融资方面的带动作用，2009年国资系统共筹资50亿元帮助“两翼”16个区县建设了特色工业园区；2010年，重庆将在基建、能源、农业和旅游开发领域组织一批国有重点企业“抱团下乡”，扶持偏远贫困区县发展。

④ 过去，从重庆主城区到最远的城口县开车要走两天，现在从主城区开车到任何区县都在8小时之内，并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四小时重庆”。

⑤ 重庆已经计划“架设城乡户籍通道，建立城乡统筹一体化户籍制度”，并明确提出户籍改革分两个阶段推进，到2020年，将实现1000万农村人群转户目标，力争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与此同时，重庆开始着手将各类社会福利与户籍剥离，通过资源均衡分配，拉平城乡社保水平。例如，2008年，重庆全面推行了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待遇水平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大致接近，并从制度上解决了转移接续问题。同时在国家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基础上，于2009年探索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在15个区县开展了试点。又如，重庆正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整合起来，逐步打破城乡界限和户籍界限（瞭望周刊，2010b）。

一般预算收入增速已连续 16 个月超过“一圈”（重庆市政府网，2010e）。

为了进一步加快“两翼”的发展，经过两年多的充分调研和市委常委与专题会议的反复研究，重庆市于 2010 年 2 月正式启动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其任务就是要确保在未来几年“两翼”农民收入增速明显快于全市平均水平，确保“两翼”农民与“一圈”农民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具体而言，该工程旨在到 2012 年时实现三大目标：一是“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18% 左右，年均增加 800 元以上，达到 6 400 元；二是“两翼”农户纯收入在 2009 年基础上户均增加 1 万元，达到 25 000 元；三是“两翼”农村有劳动能力的农户，95% 要实现万元增收目标（重庆日报，2010）。

在短短三年里要实现这三大目标可谓雄心勃勃。那么，重庆的底气从何而来呢？底气就在于两翼地区拥有的 4 743 万亩宝贵的林地资源，换句话说，“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完全可以与“森林重庆”相辅相成、并行不悖。重庆的计划是，在三年里，市财政投入 100 亿元，并安排银行信贷资金 650 亿元，支持“两翼”农民大力发展与森林相关的产业，包括林禽养殖（开发林地，建立养殖基地）、林下养畜（开发林地，发展肉牛、奶牛、山羊、肉兔养殖）、林地种植（发展林菜、林菌、林药、林蜂等）、林业产业（发展速丰林、油茶、茶叶、药材等）、林果产业（发展柑橘、核桃、板栗等）、森林旅游（发展森林公园，尤其是国家级森林公园）（杨娟、王渝凤，2010）。

重庆的地图酷似一只火凤凰。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借此有一个好比喻：“如果只是主城大发展，把头抬起来，‘两翼’跟不上，翅膀不硬，伸不开，头抬得再高，重庆也飞不起来。所以，重庆振翅高飞的关键在‘两翼’……”（杨娟、王渝凤，2010）。反过来说，如果“两翼”展开，重庆这只火凤凰将一飞冲天，直上九霄。

四、国民共进

“五个重庆”与“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注重的都是民生。用薄熙来的话说，全市各级党委、政府都“要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不求经济指标长得最快，但求老百姓生活改善最明显；不求高楼大厦盖得最多，但求老百姓过得最幸福”

（薄熙来，2009）。过去几年，重庆财政对民生的倾斜可以从下表中看得十分清楚。从2007年到2009年，民生支出连续三年占到重庆一般预算支出的50%以上。重庆还明确规定，公共服务预算增量的70%必须投向农村，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人民网，2009）。

表3 重庆近年来一般预算支出（2006年—2009年）

单位：亿元

项 目	2006	2007	2008	2009	指数 2006 = 100
一般预算支出	594.254 3	768.388 6	1 016.011 2	1 317.455 5	221.7%
一般公共服务	92.800 0	111.371 0	139.018 3	158.965 6	171.3%
公共安全	47.670 9	55.395 0	65.915 8	75.119 4	157.6%
教育	88.442 6	121.546 6	153.495 1	194.476 5	219.9%
科学技术	7.953 7	11.051 3	15.127 9	17.225 7	216.6%
文化体育与传媒	6.797 7	10.581 1	16.543 9	18.973 0	279.1%
社会保障和就业	110.830 4	138.968 2	172.266 5	228.742 0	206.4%
医疗卫生	21.502 8	33.970 5	51.636 2	76.817 9	357.2%
环境保护	27.191 8	38.254 1	52.929 7	54.475 2	200.3%
城乡社区事务	66.320 8	91.084 5	124.613 8	177.590 6	267.8%
农林水事务	41.562 8	55.965 7	76.724 2	125.399 7	301.7%
交通运输	22.225 1	36.084 8	47.925 9	64.643 1	290.9%
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	30.548 2	51.023 5	71.740 7	91.328 6	299.0%
其他支出	30.407 5	13.092 3	27.097 3	27.986 3	92.0%

资料来源：2006年—2008年数据来自历年《重庆统计年鉴》，2009年数据来自重庆市财政局网站 http://cqcz.cq.gov.cnzwgknews_detail.aspx?id=23709。

不过，一般预算支出总量与结构的变化只是有助于我们了解重庆公共政策的走向。其实，重庆在民生方面的投入远远大于一般预算中的数字（2009年为1 317亿元）。例如，根据2009年—2012年规划，仅“宜居重庆”四年建设资金总量便高达8 761亿元。同时，到2012年前，还要用3 000亿元打造“畅通重庆”。再加上“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方面的投入，“五个重庆”到2012年前的总投入将超过1.2万亿元，平均每年投入3 000多亿元（领导决策信息，2009）。一般预算以外的钱从何而来呢？重庆模式的奥秘在于，其中相当大一块一

般预算以外的投入来自国有资产的增值。

在对待国有经济上，重庆模式从社会主义 1.0 与 2.0 版本中都吸取了养分。一方面，它坚持改革，不排斥非公有经济；另一方面，它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努力将国有经济做大做强。用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话说，“如果我们的改革最后把过去的一套彻底否定，把西方的一套原原本本拿来，我觉得这不叫改革。也就是说，不完全把西方的那套经营模式纯而又纯的私有化的东西给拿过来，我们应该有国有的东西，而且应该从国有这个东西里边汲取它体制上的精华，发挥它机制上的优势，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更灵活有效，在目标上应该体现为广大的民众更好地服务，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优越性，这就是有声有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瞭望周刊，2010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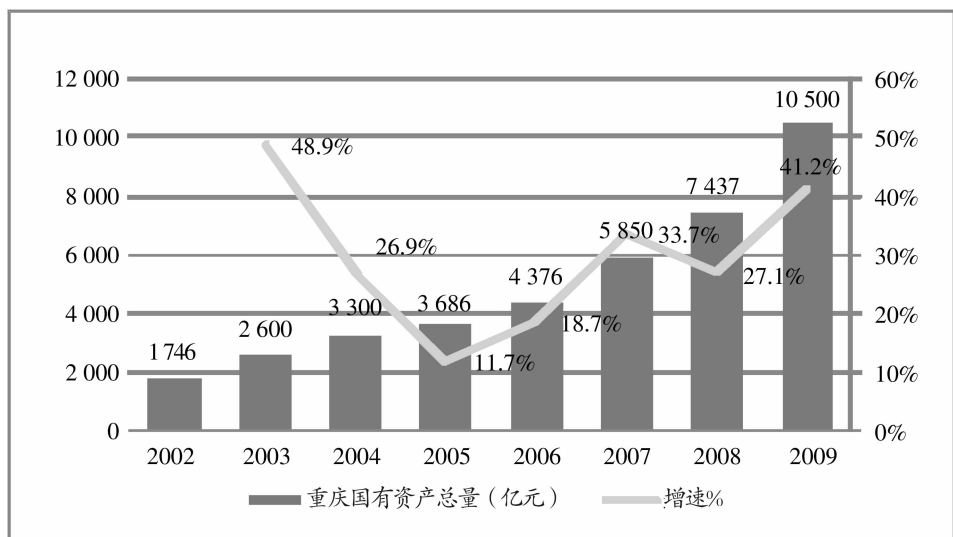


图2 重庆国有资产总量与增速

资料来源：历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

重庆市国资委成立于2003年。此前，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只有1700亿元，分散在60多个企业集团，1500多个下属公司手中。当时，国有经济可以用“小、散、乱”来形容。自2003年以来，重庆市国有资产总量快速扩张，年均增长率高达29.7%，而同期中央国企、上海国企与四川国企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5%、7%、8%。因此，到2009年底，重庆市的国有集团资产总额已达到10

500 亿元，在全国的排名也从第 19 名跃居第 4 名（图 2）^①。

在资产总额不断攀升的同时，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资产质量与产业布局也不断改善。与 2003 年相比，2009 年国有企业净资产从 376 亿元增长为 2 722 亿元，增长 624%；年利润 268 亿元，增长 30 倍；股东回报率 10.7%，提高了 8.3 个百分点；国有集团均资产 292 亿元，增长 564%^②；资产负债率从 97% 下降至 60% 左右的合理范围；产业布局从 80% 以上集中在工商业转变为基础设施、工商产业、地方金融 4:3:3 新格局（投融资集团占 40%、工商产业集团占 30%、地方金融企业占 30%^③），更加适应重庆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崔坚，2010）。

为什么重庆的国有集团可以在短时间里有如此亮丽的表现呢？这与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市长黄奇帆经营国有资产的理念息息相关。

20 世纪 90 年代，薄熙来在大连任市长、市委书记，黄奇帆在上海参与浦东新区的开发。薄熙来那时便提出一个思路：国有企业是国有资产，城市更是国有资产（薄熙来，2001）。在他的领导下，大连把城市作为国有资产来整体经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效果。经营城市这份国有资产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如何使城市土地整体增值，二是如何利用城市土地的增值。通过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功能以及优美的自然环境，大连实现了城市土地整体增值。土地增值以后，大连并没有把它们随随便便地批租出去，而是将土地增值集中起来，用于土地的再生、用于市民住房建设、用于吸引外来投资、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与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使城市整体进一步增值^④。1992 年，薄熙来担任大连代市长时，全市的可支配财力仅为 21 亿元，到 1999 年，他离开大连前，大连可支配财

① 自从 1997 年直辖以来，重庆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在最近几年，它的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已经跃居各省市的前列。即使是国际金融危机肆虐的 2009 年也未能使其放缓步伐，当年增长速度高达 14.9%，在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列第三，大大超过东部沿海省份。

② 资产百亿集团达 22 户，而六年前只有 2 户；年销售百亿集团达 7 户，而六年前没有。

③ 2005 年以前，重庆地方国有经济在金融业里面的份额几乎是零，而现在重庆五大地方金融企业（即重庆银行、重庆农商行、重庆三峡银行、西南证券、重庆信托）基本由国有企业控股。

④ 在担任大连市市长期间，薄熙来提出“一切资本归政府”，大连的各项建设项目由市长或主管副市长根据规划要求组织论证，坚持“规划一张图，审批一支笔”。一定时期规划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极大地提高了城市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避免了个别部门的利益驱动造成城市土地和空间资源的浪费。

力已增长到 90 亿元。换句话说,在此期间,通过经营城市,大连多挣多花了几百个亿,把自己绿化、美化、净化成一座让世人为之赞叹的花园城市,薄熙来本人也于 1999 年被授予“联合国人居奖”。

如果大连是靠经营现有城市来发展的话,当年浦东开发则靠的是经营未来城市。因为土地属于国有,原本是城郊的浦东创造出一个独特的土地开发与融资模式,即“财政空转,土地实转,成片规划,滚动开发”。刚设立的浦东新区首先把估算出来的地权收益作为其四个开发公司(陆家嘴集团、金桥集团、张江集团、外高桥集团)的国有股本,并以此向银行贷款,展开第一轮开发。开发带来基础设施与投资环境改善后,地价必然上升,国有股本升值,为展开新一轮开发创造了条件。这样一轮轮滚动开发下去,通过国有股分红的形式,使土地增值收益不断用于下一步开发,直至浦东新区建成^①。作为浦东开发的参与者与领导者之一,黄奇帆见证了神奇的“浦东逻辑”(赵启正,2007)。

2001 年调入的黄奇帆与 2007 年调入的薄熙来把他们在国有资产经营方面的经验带到了重庆。

2002 年,在黄奇帆主导下,重庆成立了城投、高投、地产、水投、水务、开投、渝富、高发等八大国有建设性投资集团,其中多家兼有土地储备功能^②。政府通过国债、规费、土地、存量、税收等“五个注入”,将零散、静态资产集中变为“八大投”的资本金;然后,“八大投”再通过银行、债券、股市、信托、海外等“五个市场”融资,放大国有资本。

日益壮大的“八大投”是建设“五个重庆”的主力军;按城市长远规划进行的“五个重庆”建设把“毛地”“生地”变为了“熟地”,从而大大增加了土地收益。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开发模式确保了土地增值收益归公。近六年来,“八大

① “据统计,截至 2001 年,上海市政府以土地批租形式向四大开发公司成片出让土地 23 幅共 61.59 平方公里,折算成国有资本共计 61.3 亿元,并作为国有股投入四大开发公司。期间,四大开发公司凭借手中的土地资本,到国内外资本市场融资,吸纳了 200 多亿元的开发资金,获得了 120 多亿元的土地转让收入,吸引了 800 多家中外资房地产公司和总量为 400 多亿元的房地产开发资金,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浦东开发开放的‘资本推手’”(龙夫,2010)。

② 例如,在 2008 年,重庆市地产集团控制性土地储备达到了 14 万亩。参见彭正均,“重庆市地产集团介绍自身体制及土地储备情”,新浪地产,2008 年 5 月 1 日, <http://sz.house.sina.com.cn/news/2008-05-01/22207127.html>。

投”实现的 563 亿元资产升值全部作为企业利润缴入了财政，成为财政投入基础设施的“钱口袋”之一。除此之外，“八大投”在这些年里累计投入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建设资金达 2 413 亿元，年均 400 亿元。例如，地产集团无条件地承担了一大批公共设施，包括科技馆、中医院、国泰艺术中心、运动学院、自然博物馆等 20 多项基础设施建设（黄奇帆，2010）。国有集团还融资 50 亿元，帮助渝东北、渝东南 16 个区县（自治县）和潼南县建设特色园区，支持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崔坚，2010）。所有这一切不仅没有占用财政资金，反而腾出了财力空间，使得重庆能够全面推行 15% 所得税、购房低契税、居民首次购房退税等政策，也使得重庆能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发展诸如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上^①。

在全国各大城市房价飞涨的同时，重庆房价涨势总体相对比较平稳，这也得益于重庆的土地主要集中在政府手中，集中在地产集团、城投公司、土地储备中心手中。通过控制国有储备土地的投放速度，重庆可以更好地控制地价^②；再通过国有投资集团承建公租房、改造危旧房，重庆得以创造出“保障低端、发展中端、遏制高端”的住房体制，与其他一些地方房地产商大量囤积土地、层层转让、土地增值落入私人腰包形成了鲜明对比（赵忆宁，2010）。

在一些思想僵化的人看来，“国进”必然导致“民退”，似乎“国”与“民”是天然的敌对关系，零和关系，不可能出现共赢局面。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既无任何理论根基，更被重庆的实践证明极其荒谬。近年来，在公有经济高歌猛进的同时，重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更快，这从图 3 可以一目了然。直辖之初，重庆非公经济占全市 GDP 的比重只有 26.2%，到 2010 年一季度，这个比重已经提高到 60.5%（重庆市统计局，2010）。这个变化只能用非公有制经济增速高于公有制经济来解释。显然，重庆发生的事证明，国民共进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变为实现。

^① 在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中，重庆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近年来一直保持 4% 以上。见崔坚“关于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改革发展情况的报告”。

^② 据国土部 2009 年下半年针对十大楼市典型城市的调查，十城市地价平均占房价的 25.7%，其中京、沪、广、深四个一线城市的比重更高些，在 27% ~ 30% 之间，而重庆最低，仅为 17%（重庆晨报，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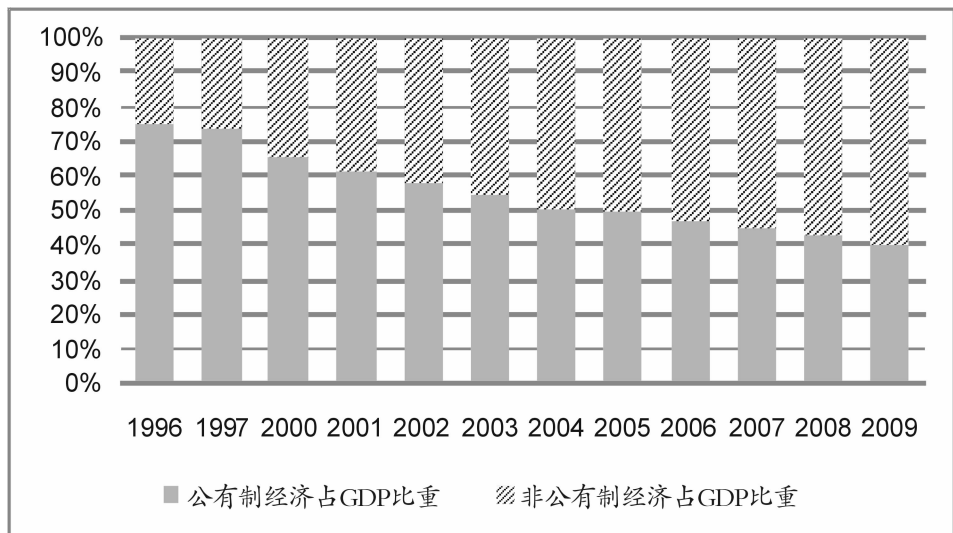


图3 重庆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1996年—2007年来自重庆市统计局，“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现状解析”，2008年7月24日，www.cqjtj.gov.cn/UploadFile/20080724102824687.doc；2008年—2009年数据来自网上。

五、群众路线

毛泽东把“群众路线”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把群众路线看作毛泽东思想“三大基本方面”之一。

群众路线有四个支撑点（王绍光，2009b）。首先，所谓“从群众中来”就是要求领导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毛泽东，1991d）。其次，深入群众是为了培植群众观点。只有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干部才能转换角色，把世界观和立场真正转到工人农民这方面来，热爱人民群众，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牢固树立起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群众观点。第三，深入群众要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民意。毛泽东在这方面分析得很透彻，“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

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毛泽东，1991b）。第四，与群众打成一片也是向人民群众吸取民智的过程。这是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1991a）。基于这个判断，毛泽东曾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1991c）。他还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毛泽东，1991d）。

群众路线是中国式社会主义 1.0 版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幸的是，在过去一段时间，这份丰厚的遗产却被淡忘了。一些党政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肆意欺压群众，成天与有钱人、小兄弟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 3.0 版本必须回归群众路线。可喜的是，在建设“五个重庆”、推动“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促进“国民共进”的同时，重庆也在尝试如何在新形势下把群众路线落到实处。

群众路线在重庆实践中具体体现为针对基层干部的“三项制度”与针对全市各级机关干部的“三项活动”。

2008 年底，中共重庆市委决定在全市村、社区普遍建立健全“三项制度”。第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要统筹安排各项工作，每周集中接待群众不得少于一次，每次不少于半天。要通过党务公开栏、网络、广播等方式，对外公布接待群众的时间、地点、联系电话等事项。要耐心听取群众反映问题；对群众反映的情况，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及时进行处理；对群众提出的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不合理要求，要做好耐心细致的解释说明工作；对应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要明确告知诉讼程序和受理单位。第二，村、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要制定进家入户走访群众的分工计划（成员间不相互重复走访），按照分工计划，每位成员每年到本村、本社区每户群众家庭走访不少于两次。重点家访困难户、上访

户、致富能人、老党员和老干部。在入户家访时，重点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落实情况，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党和政府的意见和建议等。第三，村、社区党组织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建议，在做好详细登记的基础上，要明确处理责任人和具体经办人，限时办理，并在规定的时限内及时反馈反映人（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2008）。

到2010年6月底，重庆8982个村、2136个社区党组织全部建立了“三项制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基层党组织书记接访群众378.7万人次，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走访群众1042.2万户，收集群众反映的问题293万件，帮助解决235.6万余件，群众对办理事项的满意度达96%（重庆日报，2010b）。

“三项活动”指的是“三进三同”“结穷亲”和“大下访（大走访）”。

“三进三同”要求各级机关干部每年至少用一周时间，新招录公务员、新提任领导干部至少用一个月时间，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区县领导干部每年下基层调研不少于三个月，市级部门领导干部每年不少于两个月。为了不给基层和农民增加负担，干部在参与“三进三同”活动时，每天要交纳25元生活费，并自带生活必需品。

“结穷亲”要求各级机关干部与贫困村或贫困户结对帮扶，尤其要把重庆18个贫困工作重点区县作为活动的重点区域，把农村建卡贫困户、城市低保户和困难党员作为重点人群，把因子女上学负担较重、有劳动能力但缺乏生产条件的困难家庭作为重点对象。重庆要求市级机关厅局级领导干部和区县级领导干部每人结对帮扶一户困难党员和一户困难群众，市级机关处级干部、区县部门和乡镇级干部每人结对帮扶一户困难党员或困难群众，一般干部职工可单独，也可以党支部或处、室、科为单位，集体结对帮扶一户以上困难群众或困难党员，确保人员不漏、对象不重，机关全覆盖、干部全参与和农村建卡贫困户全结对。结对干部每年必须深入帮扶对象家中一般不少于两次。2010年6月下旬召开的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会又决定将“结穷亲”实现机关全覆盖、干部全参与，与农村50万贫困户全结对（重庆日报，2010c）。

“大下访”要求区县党政主要负责人每人每月下访不少于一次（全年每人不少于12次），区县其他市管领导干部开展下访活动原则上每人每月一次，区县及以下各级干部也要采取定点接访、重点约访、带案下访、座谈走访、驻点指导、专

题调研等方式参与“大下访”活动。“大下访”的目的是主动为群众诉求提供畅通的表达渠道，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待群众信访或上访，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

早在2007年5月，重庆市便全面启动了“万名干部大下访”活动，七万多名来自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以及各级法院、检察院，市和区县（自治县）两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以及乡镇（街道）的领导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聆听群众的呼声和愿望，尽可能为老百姓释疑解惑、济困解难（罗静雯，2007；何昌钦，2007）。2009年4月底，重庆市委又决定，在“大下访”的基础上，开展干部“大走访”攻坚行动，动员全市20万名干部，深入基层，走近群众（王一敬，2009）。“三进三同”则开始于2009年7月。“结穷亲”是“三进三同”的副产品，2009年12月后迅速在两万多机关干部中展开（黄远固、苏伟，2010）。2010年3月，重庆市委正式出台《关于在全市机关干部中开展密切联系群众“三项活动”的意见》，明确要求不断深化“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等密切联系群众的“三项活动”，把它们建设成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中共重庆市委，2010）。“三项活动”开展的时间虽然还不长，但到2010年5月30日其成效已十分显著。

在“三进三同”方面，重庆全市共有7.6万名机关干部深入805个乡镇49.9万户农家。他们不仅累计参加劳动24万天，还走访了群众161万人，召开座谈会4.9万场次，形成调研报告2.4万份，制定发展规划6.7万份，解决群众纠纷2.8万起。

在“结穷亲”方面，全市共有22万名干部职工结交了“穷亲”约36万户，送去帮扶钱物2.4亿元，送去脱贫致富项目24.5万个，解决具体困难17.6万个，资助困难家庭6.3万户2113万元，帮助就学2.3万人，帮助就业12.3万人。

在“大下访”方面，20万名干部包案、带案下访，主动约访、上门走访了群众92万次，累计接待群众信访问题100万人次，在拉网式排查大批信访积案的基础上，各级财政投入79亿元解决各类问题11万件次，其直接受益群众达500多万人。“大下访”的效果已很快显现出来，困扰全国各地的信访（尤其是所谓“非正常上访”或“非访”）问题大大缓解，群众信访总件次和总人次下降幅度每年都在40%以上（重庆日报，2010d）。

“三项制度”与“三项活动”的核心是干部下基层、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眼睛向下、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各级干部才能体会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回应群众的诉求，感知群众的智慧，增进与群众的感情，拉近与群众的距离，摒除脱离群众的衙门作风，恢复干群的“鱼水关系”，把“五个重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国民共进”落到实处，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六、结语

1989年，日裔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与政治自由”制度已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Fukuyama, 1989）。20年后的2009年，英国广播公司委托两家民调机构在全球27个国家（包括中国）对随机抽样的29 000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福山的判断是虚妄的、完全站不住脚的。这项调查显示，对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的不满遍布全球，在27国人民中平均只有11%的人认为，这种制度运转良好，不需政府干预^①。相反，平均有23%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带有致命的缺陷，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来取代它。持这种看法的人在法国高达43%、墨西哥高达38%、巴西高达35%，乌克兰高达31%。在各国人民中，最普遍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要靠改革与监管来纠正，而改革的方向是政府应该在拥有或直接控制本国主要产业、财富再分配、企业监管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BBC, 2009）。换句话说，“自由资本主义”不得人心。

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才能真正体会重庆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3.0的意义。中国人民不相信历史已经终结，仍然在不懈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会固步自封；跨越上一个发展阶段后，会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和实验探索如何为中国式社会主义“升级换代”（王绍光，2008）。

在“匮乏阶段”与“温饱阶段”，中国已经创造了辉煌的中国式社会主义1.0与2.0版，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小康阶段”后，“衣食”或“温饱”

^① 美国认可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最多，达25%。

不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国式社会主义 3.0 版本必须大幅度增加对公共产品与服务投入，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重庆经验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五个重庆”致力于解决广大人民群众“住”（宜居）“行”（畅通）以及公共消费（平安、生态、健康、教育、文艺、科技）问题；“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致力于解决社会平等问题；“国民共进”致力于解决中国式社会主义 3.0 版本的经济基础问题；“群众路线”致力于解决中国式社会主义 3.0 版本的政治基础问题。说到底，“五个重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国民共进”“群众路线”是一个整体，它们的共同着眼点是人，是实实在在的人，是普普通通的人，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它让中国式社会主义 3.0 版本的未来与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生活经验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了一项充满希望的伟大事业。

参考文献

- 薄熙来 (2001). 如何经营城市这份国有资产. 人民日报, 5 月 14 日. 参见: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May/33582.htm>.
- 薄熙来 (2009). 为人民服务是党的生命线.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2 月 29 日. 参见: <http://cpc.people.com.cn/GB/68742/69481/69482/10675467.html>.
- 重庆晨报 (2009). 10 城市地价占房价平均 25.7% 重庆最低仅为 17.01%. 10 月 9 日. 参见: <http://cq.people.com.cnNews2009109/2009109135418.htm>.
- 重庆晨报 (2010). 今年要再种十年的树. 6 月 30 日. 参见: <http://cqcb.com/cbnews/cqnews/2010-06-30/82648.html>.
- 重庆商报 (2010). 公安部通令嘉奖重庆警方打黑除. 6 月 18 日. 参见: <http://news.163.com/1007/69EOI33000014AED.html>.
- 重庆市人民政府 (2008). 关于印发“健康重庆”卫生行动计划 (2008—2012) 的通知. 12 月 15 日. 参见: <http://www.cq.gov.cnzwgkzfgw/126522.htm>.
- 重庆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 (2010). 2009 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 月 26 日.
- 重庆市统计局 (2010). 2010 年一季度重庆市非公经济运行状况简析. 5 月 6 日. 参见: www.cqtj.gov.cn/UploadFile/20100506101426437.pdf.
- 重庆日报 (2010). 重庆启动“两翼”增收工程, 三年实现三大目标. 2 月 22 日. 参见: <http://www.cqcb.com/cbnews/cqnews/2010-02-22/17266.html>.
- 重庆日报 (2010b). 三项制度: 群众动嘴 干部跑腿. 7 月 8 日. 参见: <http://cqrpaper.com>.

cqnews.netcqrhtml/2010-07/08/content_1202588.htm.

重庆日报 (2010c). 结穷亲: 机关全覆盖, 干部全参与. 7月8日. 参见: http://cqrbeper.cqnews.netcqrhtml/2010-07/08/content_1202566.htm.

cqnews.netcqrhtml/2010-07/08/content_1202566.htm.

重庆日报 (2010d). 三项活动: 历练干部新平台, 联系群众直通车. 7月8日. 参见: http://www.cq.xinhuanet.comnews2010-07/08/content_20279566.htm.

重庆市政府网 (2010a). 今年新建住房近三成是保障房 实施“5+1”模式. 2月8日. 参见: <http://www.yjq.gov.cnom/ShowInfo.aspx?id=8E9CD7D6-F92F-4693-AEB9-143DDC38D6FC>.

重庆市政府网 (2010b). 今年重庆实现村村通公路. 3月4日. 参见: <http://www.cq.gov.cnom/todaynews195691.htm>.

重庆市政府网 (2010c). 重庆积极推进农村客运发展. 3月30日. 参见: <http://www.cq.gov.cnomzwgkzfx/201273.htm>.

重庆市政府网 (2010d). 1—4月重庆安全生产情况通报. 5月14日. 参见: <http://www.cq.gov.cnomzwgkqwb/212848.htm>.

重庆市政府网 (2010e). 重庆一圈两翼协调发展态势明显. 5月17日. 参见: <http://www.cq.gov.cnomzwgkzfx/213248.htm>.

崔坚 (2010). 关于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改革发展情况的报告. 中国人大网, 5月18日. 参见: http://www.npc.gov.cnomnpexinwendfrdchongqing/2010-05/18/content_1573126.htm.

加尔布雷思 (1965). 丰裕社会. 徐世平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何昌钦 (2007). 万名干部大下访, 七万干部深入基层. 重庆晚报, 7月4日. 参见: <http://www.luckup.net/show.aspx?id=17862&cid=34>.

华龙网 (2007). 杨庆育作《市人民政府关于“一圈两翼”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工作情况》的报告. 9月25日. 参见: <http://cqtoday.cqnews.net/system09/25/000901254.shtml>.

华龙网 (2008). 健康重庆动员大会: 350亿打造健康之城. 12月19日. 参见: http://cq.cqnews.net/szzwyw200812/t20081219_2794269.htm.

华龙网 (2010). “平安重庆”让重庆成为安全放心城. 6月1日. 参见: http://cq.cqnews.net/szzwyw201006/t20100601_4368636.htm.

黄奇帆 (2010). 地产集团要着力发挥好五大功能.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月10日. 参见: http://www.sasaccq.gov.cnomnewsshow_content.asp?id=4024&class=000100060005.

黄有光 (2003). 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黄远固、苏伟 (2010). “结穷亲”切合重庆实际的党风廉政建设新实践. 重庆日报, 4月2日. 参见: http://www.cq.xinhuanet.com/zhengwu/2010-04/02/content_19414198.htm.

李伟 (2010). 群众积极参与 真心认可唱读讲传. 重庆晚报, 6月11日. 参见: <http://www.luckup.net/show.aspx?id=17862&cid=34>.

www.cqwb.com.cnomeqwbhtml/2010-06/11/content_216714.htm.

瞭望 (2010). 转型中国的重庆突破. 4月20日. 参见: <http://www.cqcb.com/cbnews/gusty/2010-04-20/63488.html>.

瞭望周刊 (2010a). 转型中国的重庆突破. 4月19日. 参见: http://www.cq.xinhuanet.com/2010-04/19/content_19563949.htm.

瞭望周刊 (2010b). 转型中国的重庆突破. 4月20日. 参见: http://www.cqcb.com/cbnews/gusty/2010-04-20/63488_3.html.

瞭望周刊 (2010c). 重庆国资: 第三财政实践. 4月19日. 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4/19/c_1242812.htm.

领导决策信息 (2009). “五个重庆”: 万亿大手笔托起新山城. 参见: <http://www.ccgov.net.cnomaspzzNewsdata.aspx?id=3677&cateid=30>.

龙夫 (2010). 开发公司模式的浦东实践. 新浪网, 7月2日. 参见: <http://finance.sina.com.cnom/leadership/mroll/20100702/06598220697.shtml>.

罗静雯 (2007). 重庆市启动“万名干部大下访”活动 干部挂牌接待群众来访. 重庆日报, 5月9日. 参见: <http://www.cpcnews.cnom/GB/64093/64100/5706934.html>.

毛泽东 (1991a). 论联合政府. 载《毛泽东选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 (1991b). 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 载《毛泽东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 (1991c).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载《毛泽东选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 (1991d). 组织起来. 载《毛泽东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七一网 (2009). 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开展“三进三同三个一”活动. 12月16日. 参见: <http://www.12371.gov.cnom/n77c25.aspx>.

人民网 (2009). 重庆市委、市政府. 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基本框架. 6月29日. 参见: <http://cq.people.com.cnomnews2009629/2009629104539.htm>.

人民网 (2010). 重庆调控房价有组合拳 将征收“特别房产税”. 4月21日. 参见: <http://society.people.com.cnom/GB/11417672.html>.

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 (2006). 印度: 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 黄飞君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扶贫与经济管理局 (2009). 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 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评估.

宋超 (2010). “软实力”初探: “唱读讲传”的故事. 21世纪网, 4月16日. 参见: http://www.21cbh.comHTML2010-4-19/2NMDAwMDE3MzI2NQ_2.html.

- 王绍光 (2008). 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 6.
- 王绍光 (2009a). 坚守方向、探索道路: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六十年. 中国社会科学, 5.
- 王绍光 (2009b). 毛泽东的逆向政治参与模式: 群众路线. 学习月刊, 12.
- 王绍光 (2011). 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 3.0: 重庆经验. 马克思主义研究, 2.
- 王一敬 (2009). 百姓的“小事”比天大: 重庆 20 万干部大走访侧记.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2 月 29 日. 参见: <http://cpc.people.com.cn/GB/68742/69481/69482/10675417.html>.
- 新华网 (2010). 重庆: 2009 年掀起绿色革命 一年种了十年的树. 3 月 22 日. 参见: http://www.cq.xinhuanet.com - 2010 - 03/22/content_19312878.htm.
- 新民网 (2010). 93.4% 的干部群众参与“唱读讲传”. 6 月 11 日. 参见: <http://news.xinmin.cn/rollnews - 06/11/5199519.html>.
- 杨娟、王渝凤 (2010). 促增收, 两翼农户变穷山为宝山. 重庆晚报, 7 月 1 日. 参见: http://cq.cqnews.net/cqztlm/sz/3j7cqwh/yw/201007/t20100701_4443353.htm.
- 赵启正 (2007). 浦东逻辑: 浦东开发与经济全球化. 上海: 三联书店.
- 赵忆宁 (2010). 双崔对话: “第三财政”与“人民的公租房”. 21 世纪经济报道, 4 月 16 日. 参见: <http://www.21cbh.comHTML2010 - 4 - 19/3NMDAwMDE3MzI3NA.html>.
- 张桂林、杨柳 (2008). 重庆: “一圈两翼”区域互动开启统筹发展新格局. 新华网, 2 月 22 日. 参见: http://www.cq.xinhuanet.comnews2008 - 02/22/content_12513937.htm.
- 中共重庆市委 (2010). 关于在全市机关干部中开展密切联系群众“三项活动”的意见. 重庆机关党建网, 4 月 27 日. 参见: <http://www.cqjgdj.gov.cnom/n47223c348.aspx>.
- 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 (2008). 关于建设“健康重庆”的决定. 12 月 29 日.
- 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 (2008). 关于建立健全村、社区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工作三项制度的通知. 11 月 14 日. 参见: <http://www.cqgzdj.gov.cnom/2009 - 6/200962171340.htm>.
- 钟谟智 (2010). “唱读讲传”: 群众文化新创举. 光明日报, 6 月 18 日. 参见: http://www.gmw.cn/01gmrb/2010 - 06/18/content_1153678.htm.
- BBC (2009). *Wide Dissatisfaction with Capitalism: Twenty Years after Fall of Berlin Wall*. November 9. Available on line: http://www.globescan.com/news _ archives/bbc2009 _ berlin _ wall/bbc09 _ berlin _ wall _ release.pdf.
- Fukuyama, F. (1989).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6: 3 - 18.
- Galbraith, J. K. (1998).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on - Mifflin Harcourt Trade & Reference.